



乔纳森·弗兰岑

世纪之初，《帝国——全球化政治秩序》成了第一本在全球引起轰动的理论著作，它与其说是对“帝国”的颠覆性研究，不如说是一个宣言，以批判的形式宣告了一个新“帝国”的到来。此书的两位作者麦克尔·哈特和安东尼奥·奈格里认为，“正是在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，帝国得以诞生”。对“帝国”将在全球迅速占据上风这个趋势，两位西方左派虽满怀沮丧，却也断言不可阻挡。

非常凑巧，美国小说家乔纳森·弗兰岑也在世纪之初发表了一部超过40万字的大部头《纠正》(2001)，在小说中，他通过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欲望之细微处的观察，预言了这个想象中的“帝国”所面临的内在危机：它在瓦解。果然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惊异地发现，“帝国”确实没有迅速取得胜利，反而深陷各种泥潭，遭遇到“中年危机”。而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尾，弗兰岑又发表了另一部超过40万字的大部头《自由》(2010，中文版已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、南海出版公司引进出版)，在上一次的预言之后，又用同样的方式为这个十年作了总结：“自由”无法为“帝国”带来幸福和安宁。

理论家总惯于高屋建瓴，站在意识形态、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指引历史发展的方向，仿佛只要看到滚滚东流的长江水，便可以假想它是一个无限的奔涌过程，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源头和另一个直接的去处，全然不顾它实际上是无数涓涓细流的暂时汇聚，最终也将分散到无数的涓涓细流和毫无方向可言的海洋中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意识形态并非意识形态，它不过是无数个人欲望博弈和叠加的过程，体制也并非体制，而是无数日常生活的汇聚。或者说，只有深入到个人的内心欲望和日常生活中，历史才会展现其真实而鲜活的面貌。这正是文学、尤其是小说的工作重点。弗兰岑干了一件漂亮活儿，在理论的时代，在新闻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字空间里，捍卫了小说的独特价值。

从内容上看，弗兰岑在新世纪十年发表的这两部小说至少有着两个共同点：第一，它们发生的起点不在繁华喧闹的东部大城市或者热闹奢靡的西海岸，而是在美国中部；第二，它们都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叙述对象来展开故事。

选择圣裘德和圣保罗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中部城市，弗兰岑显然有其用意。在这里它们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